

阅读改变女性 女性读懂世界

女性阅读:在沉静中生发澎湃力量

由于社会因素和个体心理的影响,女性在感情、事业和家庭等方面有时会陷入抉择的困境,而阅读为女性提供了一个思考与解决问题的方向。在女性力量崛起的今日,阅读愈发成为女性精神的补给。在今年世界读书日形式多样的活动中,一些推动女性阅读的相关活动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些活动有着怎样的参与形式,具体效果如何?女报《新阅读》专刊就此进行了采访。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黄婷

“阅读是人类思想解放的一道闸门,一页页书翻过,推动闸门的力量也越强大。”第26个世界读书日,我们关注女性阅读。由于社会因素和个体心理的影响,女性在感情、事业和家庭等方面有时会感到困惑,陷入抉择的困境,而阅读为女性提供了一个思考与解决问题的方向。阅读不仅能让女性提升知识,开阔视野,还能帮助她们获得精神享受,确立个体价值。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0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29本。这份报道未涉及女性阅读的相关数据,但在不久前某电商发布的《2021女性阅读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在2020年,女性读者人均购书达到8.1本,高于男性,女性逐渐成为图书消费市场主力。

世界读书日这天,北京的李女士一口气买了好几本书。她在2020年看了38本书,今年给自己定的阅读目标是40本。对于图书类别,她没有特别的偏好,文学、社科和漫画都会涉及。她会随时在包里放一本书,利用碎片时间来看书。于她而言,阅读已经是一种习惯,不仅能让她获取知识,了解自己不知道的世界,而且能让她打开脑洞,获取灵感。

在女性力量崛起的今日,阅读愈发成为女性精神的补给。在今年世界读书日形式多样的活动中,一些推动女性阅读的相关活动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些活动有着怎样的参与形式,具体效果如何?女报《新阅读》专刊就此进行了采访。

“阅读改变女性,女性改变世界”

“阅读回答女性对爱、婚恋、职业、成长的困惑;阅读唤醒女性对觉醒、独立、自由的渴望;阅读给予女性勇气、快乐。”世界读书日前

后,读蜜传媒图书联合13家出版品牌,在微博上发起“阅读改变女性,女性改变世界”的活动,推荐72本书,设计九个主题书单,为女性成长困惑提供书籍帮助,并鼓励读者分享女性励志阅读故事。

读蜜传媒图书营销编辑温欣严介绍说,“很多女性在面临人生困惑时其实比较迷茫,于是我们选取了女性关注的话题——爱、自由、独立、觉醒、快乐、勇气、成长、职业、婚恋,总有一个书单能为女性提供阅读上的参考。后来我们发现,‘勇气’书单是中奖者最偏爱书单。”从体裁上看,该书单多为社科书籍与小说,但是在题材类型上比较广泛,从反馈效果上来看,很多读者对这样跨领域的送书感兴趣,参与欲望更强。

这是读蜜首次策划联合其他出版社做女性读书活动。活动开始前,他们心理预期很低,但活动效果却远超大家预期,微博话题热度超过了100万。“女性不是要去颠覆世界,而是要更有力地去平衡世界”“书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女儿,我们自己”“通过阅读来获得书籍的力量,女性要不断前行啊”……活动期间,他们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感人评论。

“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在参与者的表达里,我能感受到中国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阅读和教育带来的有力支持,女性通过阅读了解自我,了解他人,了解世界,最后改变世界。‘女性改变世界’不是一个夸大的口号,而是女性正在进行、沉静且有力的行动。”温欣严说道。

女性的生活多姿多彩,女性阅读和精神生活也愈发丰富,无论是生活还是网络,女性渴求知识的声音越来越多。温欣严对女性阅读发展持乐观态度,她认为:“女性阅读从探讨何为女性、到社会怎样塑造女性,已经转变为我要成为

什么样的女性。如何做出启发女性和女性喜爱的书籍,是值得出版业同仁思考的问题。”

“和WOMAN一起,书写我们”

“三秒内,你能说出三个女作家的名字吗?”世界读书日当天,网易文创旗下工作室——公众号“三三星球”推出“和WOMAN一起,书写我们”的活动。据三三工作室内容主管蔡捷文介绍,他们和数十家出版社联名推出了一份女性主义图书书单,并以此设计了一套“WOMAN不服书”盲盒,盲盒内含读书日定制帆布包、主题明信片 and 一本书单里的图书。“这个读书日,我们希望女性读者和我们一起以女性主义为主题写三行小说,希望这一个小小的创作行动,可以击碎长期抑制女性书写的噩梦,每一个女孩都有成为简·奥斯汀的可能性。”

活动在各大社交平台的数据可观,微博话题阅读量超200万。粉丝活跃地创作三行小说,出现了不少有趣且深刻的“作品”：“她读书时不能休息,因为老师说她没男生有天赋;她工作时不能休息,因为同事背地说她是走后门潜规则;她结婚后不能休息,因为邻居说她不像个母亲和妻子”“他们说家里的房子、车子都要留给男孩子,女孩子要嫁给好人家、要彩礼,她说对不起我偏不”……短短几句,却仿佛看到了一位又一位女性的一生。也有读者的留言让人印象深刻,留言写道:“今天突然意识到以前好像都想当然地认为(一些书)作者是男性了,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这样默认各个领域优秀的人都是男性,而忽略了女性的作为。”

蔡捷文表示,当天公众号的推文涌现了近900条评论,是平时留言数量的好几倍。为此他们还建了“WOMAN读书会”的读者群,并在群里发起女性书单推荐接龙的游戏。“随着女性话题越来越多地占据社交媒体的话题榜单,各个出版社也在推女性主义相关的图书。越来越多的男人读到女性主义相关的书,也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写作。不管是女性阅读还是女性写作,这会是

在美国,浪漫小说的主要受众是已婚、育儿的家庭主妇。为何这些女性偏爱浪漫小说?她们希望从浪漫小说中获得什么?在《阅读浪漫小说:女性,父权制和通俗文学》中,珍妮斯·A.拉德威认为女性阅读浪漫小说是对社会性别分工“微小但又合理的抗议形式”,人们应该正视其背后的深层含义。

■ 孙伟

长久以来,文学评论家、学者们掌握着文学界的话语权。在他们那里,拷问人生意义与价值的严肃文学才是文学园地真正的庄稼,能真正给人以给养。通俗读物,包括但不限于浪漫小说,则是一些不入流的作品,即便不算“毒草”,也是有待提防的野草。然而,市场接受却呈现出相反的情况:严肃文学少有人问津,而通俗读物占据着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这种现象到底说明了什么?是这个世界有误,还是我们需要用新眼光来看待这一切?

美国文学评论家、杜克大学文学与历史系荣誉教授珍妮斯·A.拉德威采取的是后一种选择。她以《阅读浪漫小说:女性,父权制和通俗文学》(译林出版社2020年7月版)一书,开启了后来蒸蒸日上的通俗文学研究的大门。传统的文学研究往往侧重研究文学文本本身,可是面对量产的浪漫小说,拉德威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合适,进而另辟蹊径,运用一种叫作“阅读人种志”的方法开始了自己最终成果丰富的探索,让人深受启发。

微小但又合理的抗议形式

在美国,浪漫小说的主要受众是已婚、育儿的家庭主妇,尤其是一个叫史密斯顿社区的女性。为何这些女性偏爱浪漫小说?她们希望从中获得什么?这些问题时时摆在拉德威的面前,驱使她设计出种种方案,考察文本及其背后的社会与文化结构。为此,她不仅研究这些浪漫小说的生产与销售过程,而且对这些读者如何解读、分类和评价此类小说很感兴趣。

作为一种商品,图书的出版与销售往往不在评论家的视野中。在他们看来,图书的意义,完全局限于文本本身,而不在文本之外。这样的看法并非无意义。但是,浪漫小说这种以销量取胜的读物,其生产、宣传与销售的过程与策略对其的意义不可忽视,尤其是作为丛书出版的一类浪漫小说。毕竟,读者肯花钱大量购买这些图书(假定她们都看了)势必说明了一些问题:这些图书或多或少满足了她们的部分渴望或需求。

跟很多美国已婚女性一样,史密斯顿女性遵循着男权社会对性别分工的无意识规定: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打理“家”这个私密空间,她们的丈夫则在公共空间闯荡,后者的世界是“竞争与公开性成就”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她们虽然无意颠覆这种秩序,却也产生不满,因为她们拥有的只是无限的照护责任,几乎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关怀的对象。为此,她们逐渐喜欢上了阅读浪漫小说。

通过访谈,拉德威认为,浪漫小说对这些女性来说发挥着“释放阀”的作用,帮助她们排解在日常生活中逐渐积累的不满情绪,“阅读浪漫小说的意义就在于这种体验本身不同于日常生活”,它“不仅能让人从日常问题及责任所制造的紧张中脱身而出,而且还创造了一个女性可以独自享有并专注于其个人需求,渴望和愉悦的时间或空间”,“是一种通往或逃到异域,或者说不同时空的方式”。无怪乎温顺的她们会在丈夫和孩子面前捍卫这一活动的正当性,尽管这么做时她们也会产生内疚感。

对父权制的反抗抑或与之合谋

那么,在这些资深读者那里,如何区分理想的浪漫小说和失败的浪漫小说?通过进一步的考察,拉德威发现,理想的浪漫小说往往满足了这些女性对一夫一妻制异性恋婚姻的想象:故事讲述的是男女主人公缠绵悱恻,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过程。其中,男主人公既有美国文化中常见并大肆张扬的男性气概,又有温柔体贴的一面——当然,两种特质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相反,失败的浪漫小说则在这方面有所欠缺,它们要么无法给出男女主人公最终相亲相爱的合理逻辑,要么是过分地宣扬了女主人公的“桃花运”。

在拉德威看来,理解“阅读浪漫小说”这一行为,需要关注“阅读”这个事件和作为文本的“浪漫小说”,因此,“阅读浪漫小说”是一种将浪漫小说作为客体的观念性行为。史密斯顿女性将其仅仅看作编码与解码,但其实不然,因为浪漫小说这个文类有着一系列“套路”,通过各式的细节(年代、服饰、吃喝用度)讲述一个神话,一个父权制的神话,尽管出版商、作者和读者都宣称它们是不同的。

可以看到,浪漫小说是悖论的集合体:一方面彰显了女性“明确地拒绝满足男性掌控女性的渴望,不愿任其剥夺她们的个人声音而被迫陷入沉默之中”,另一方面令人遗憾地对父权制妥协;一方面强调了女性的独立与智慧,另一方面将女性的性欲视为洪水猛兽;一方面唤醒女性的不满情绪与寻求改变的渴望,另一方面通过安排理想的男主人公(尽管现实中找不到,但还是许下这个承诺,即可能有)来消解甚至否定之。尽管如此,拉德威最后还是总结道,“决不能忽视这些微小但又合理的抗议形式”,而是要将它们汇聚成流,努力发扬光大,让更多人正视女性阅读浪漫小说背后的深层含义。

——评《阅读浪漫小说:女性,父权制和通俗文学》

重建阅读文化:真理与意义的追寻之途

——读《阅读的力量:从苏格拉底到推特》

对阅读价值的纷争从文字诞生起便未停歇。在《阅读的力量:从苏格拉底到推特》一书中,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弗兰克·富里迪回到阅读的历史开端处,评述了从苏格拉底至今,不同时代对阅读的主流看法及其社会文化根源。穿梭于数百位西方思想家关于阅读的精彩论断中,富里迪拨开将阅读工具化、贬低化的迷雾,呼吁重建阅读的力量。

■ 范语晨

书籍即将走向消亡,注意力缺乏的人们再无心读完一本书……这些忧心忡忡的论调在今天俯拾即是。进入数码时代,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阅读将向何处去”成为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弗兰克·富里迪告诉我们,对阅读价值的纷争并不是件新鲜事,而是从文字诞生起便未停歇。在《阅读的力量:从苏格拉底到推特》(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版)一书中,富里迪回到阅读的历史开端处,评述了从苏格拉底至今,不同时代对阅读的主流看法及其社会文化根源。穿梭于数百位西方思想家关于阅读的精彩论断中,富里迪的落脚点依旧是阅读在当下面临的真正挑战:文化价值观的迷失。拨开将阅读工具化、贬低化的迷雾,富里迪呼吁重建阅读的力量——“以寻求真理和意义为旨归,拥有改造人类意识和世界的伟大力量”。

阅读有益吗?关于读写能力的古老悖论

能读会写是一件好事吗?如今这个问题的答案已毋庸置疑。而富里迪对阅读观的历史梳理却表明,许多世纪以来,人们对读写能力的作用都持暧昧态度;古希腊的哲人甚至曾认为书籍是危险的。苏格拉底使用希腊语中的“药物”一词来比喻写作,以表达书面文本阅读具有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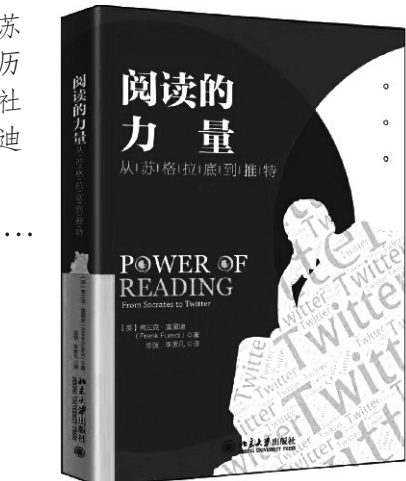
悖论性:它可能是一剂良方,也可能是一味毒药。

苏格拉底的担忧发生于口传时代向书写时代的转折点上,也源于雅典政治文化中的精英立场。他一方面认为,阅读书面文字丧失了口头交流的本真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在当时的雅典,只有少数人拥有阅读书面文本的资格。苏格拉底认为大多数人并无必要获得这一资格,他担心一旦文本传播到“不配获得知识的人”手中,便会引发误读,进而破坏社会秩序。

阅读的古老悖论由此体现在,人们通过它确立道德规范,却又担心它威胁道德规范。富里迪敏锐地指出,这实际上体现着人类对一切“媒介效应”的矛盾心理。中世纪的宗教狂热确立了文本的权威性,而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到来,阅读标志着理性和进步的力量。到18、19世纪时,西方世界已将阅读看作具有内在价值的、自我完善的方式。即便如此,人们对媒介效应的永恒恐惧未曾退场。当古腾堡的印刷术使阅读实现大众化时,思想家们没有一刻停止担心不良书籍会毒害缺乏辨识力的下层民众。著名的“维特热”便是经典的媒介事件。

阅读还重要吗?围绕新技术的“阅读之战”

随着读写能力成为人们处理日常事务的必要技能,阅读的危害性已不再是人们对阅读的讨论焦点。不过,随着新一轮



的媒介革命,“永恒恐惧”的对象换成了数字技术。关于阅读的对立意见,则从有益还是有害,变成了重要或不再重要。

这场“阅读之战”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思潮。由于目睹了现代文明在20世纪的种种恶果,这一思潮激烈地抨击启蒙运动确立的文化理想,认为阅读的重要性被大大高估了,它不过是“文化精英利用读写能力来行使其权威”的方式。反文化情绪带来了一场对阅读的价值祛魅,这与技术乐观主义者的主张不谋而合。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用苏格拉底式的怀旧观点为技术至上论辩护,认为印刷文本的阅读造就了一种封闭的、狭隘的交流形式,使人的复杂性丧失殆尽,而数字传媒的即时性、强参与性则能复兴口传时代的社群文化。

在麦克卢汉等人对印刷文化之死振臂欢呼时,技术悲观主义者却痛心疾首。他们将美国民众图书阅读量的下降归咎于电子媒介的增长,认为它“夺走了美国人对阅读的兴趣”,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阅读危机。他们哀叹道,电子媒介这一

恶魔已经无力让学生学会阅读。连文学评论家们都吃惊地发现,自己在阅读严肃作品时感到困难重重。

拨开迷雾:重新发现阅读的价值

面对两大阵营的激烈对垒,富里迪对阅读史的扎实剖析与现实问题接上了头。他清醒地指出,技术本身并不是导致当下阅读难题的关键:“他们都把阅读意义和阅读地位的变迁归因于数字媒介的出现。然而历史表明,大多数被他们归因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影响的事物都曾经是过去几个世纪的人们关注过的主题。”

那么,抛开技术的烟幕弹,我们究竟如何重新定义阅读的未来?富里迪的答案是回归内容与意义。他认为,大家之所以会围绕技术吵昏了头,根源在于仅仅将阅读看成了获取知识和信息、实现交流的工具,或是区分身份地位的标识。

事实上,书籍远不只是一种曾经兴盛、现被商讨应当保留还是取缔的媒介,如果我们在媒介或工具的框架中评估阅读的价值,无疑会架空读者与阅读内容间的深层互动,无视由此成就的思想能力,而这正是阅读的生命力所在。正如富里迪所说,“阅读活动最令人兴奋和最具转化力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读者进行解释并获得意义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学会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并最终做出自己的判断。”

从苏格拉底到推特时代,人们对阅读的认知经历了数次变迁,也常常呈现出复杂的张力。富里迪试图阐明,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成就之一,对真理和意义的追寻始终是阅读的旨归。因而,阅读的命运不会取决于任何一项新技术的诞生。哀叹或欣赏于书籍的死亡无疑是片面的,重建面向意义的价值坐标,才可能从阅读中获得力量,打开“通向几乎所有重要事物的知识之门”。